

在西方世界塑造中国诗人的正义形象

——美国女传教士费理雅的《屈原传》

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 陈亮 许美德

传记中屈原知识广博，诚实严谨，恪尽职守，忠君爱国；即使面对仇敌，也能保持谦和而有威严的礼节。传记通过屈原在上官大夫面前和独处时的不同表现，丰富了屈原复杂的心理活动，刻画了屈原坚强的性格。

屈原是中国第一位伟大诗人，不仅是中国人景仰的先贤，也引起了来华传教士的关注。早在17世纪初，葡萄牙籍耶稣会士阳玛诺(Emmanuel Diaz Jr.)就曾运用楚辞典故创作天文学著作《天问略》，通过与中国经典对话作为传播西洋科学和宗教的途径。而美国女传教士费理雅(Lydia Mary Fay)1865年在《中日丛报》上发表的《屈原传》(Memoir of Kih-Yuen)，则是面对欧美读者，用英语为屈原作传记，在西方世界塑造中国大诗人屈原的正义形象。这篇传记具有丰富的学术价值，值得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，重新审视它的闪光之处。

费理雅是美国圣公会的女教士，1851年来华，在上海主持圣公会创办的男子寄宿学校，该校后来发展为圣约翰大学。费氏精通中国经典和上海方言，她于1867年用上海方言编译了两本宗教教材《旧约书前七卷问答》和《旧约书后三十二卷问答》；1874年用中文完成《大学考义》与《中庸考义》。1878年病逝于烟台。卫三畏(Samuel Wels Williams)曾在《汉英韵府》序中高度评价称赞她的语言天才。

《屈原传》的主体分为四个部分，分别为屈原被逐出宫廷、屈原请教“占卜者”、屈原之死和尊崇屈原的纪念。《屈原传》的学术价值有如下三点。首先，《屈原传》较早地向英语世界详细介绍了屈原完整的一生，艺术再现了屈原的光辉形象。1879年英国庄延龄(Edward Harper Parker)发表的《离别之忧——离骚》曾被学界认为是第一次介绍《楚辞》到英语世界。后来我们找到1874年英国道格思(Robert Kennaway Douglas)发表的《评德理文侯爵的〈离骚〉》一文，以为是最早的一篇。但是随着中西交往文献资料的公布与研究的深入，我们发现1865年费理雅的《屈原传》时间更早，内容更丰富，而且塑造出真实、生动、丰满的屈原形象。传记中屈原知识广博，诚实严谨，恪尽职守，忠君爱国；即使面对仇敌，也能保持谦和而有威严的礼节；悲伤和失望最后使他面容憔悴、形体枯槁，但是他仍然保持着优雅的步伐与风度。他在污浊的世界里仍然保持着高贵的内心和高雅的气质。他的自杀是不愿意与世人同流合污，如蛹化蝶般追寻光明与纯洁，追求生命的终极意义。

其次，《屈原传》借鉴了西方小说的艺术方法和表达技巧，运用心理与细节描写使人物形象的刻画益发真切动人。如上官大夫与屈原的矛盾冲突：

在新王登基之后，上(官)大夫对屈原的憎恨与日俱增。当他接到流放屈原的命令时，非常得意，决定亲自向屈原宣布，希望能高兴地看到他为被迫离开祖国而痛不欲生。屈原见他时，谦恭致敬，一言不发地接下命令，鞠躬致礼，看不出一丝悲伤或者愤怒的迹象。他于是告辞，并向屈原谦恭致敬，回以他进门时所受的礼节。屈原独自一人时，才尽情地悲伤与愤怒。

传记通过屈原在上官大夫面前和独处时的不同表现，丰富了屈原复杂的心理活动，刻画了屈原坚强的性格。而上官大夫态度的前后转变，也起到了衬托作用。

最后，《屈原传》的内在叙事立场是西方的宗教信仰和价值理念，塑造的屈原形象与中国传统记载存在差异。我们可以从费氏对“龙舟节”的观察看出她的思想倾向：

这个节日的显著特色，是没有生产偶像崇拜的供品，没有崇拜的偶像，没有在庙里烧香，也没有建造纪念他的纪念碑、塑像与偶像。人民并不假装相信他是一位神，而只是一位善良与忠诚的人，这在一群迷失在偶像崇拜的群体里，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指向真理与诚实的礼赞。

在费氏眼中，“龙舟节”的纪念活动是屈原高尚人格的精神感召所致，是非偶像崇拜的，也是“令人愉快”的。费氏反对偶像崇拜，与她的基督教信仰有关，来华传教士大多如此。她在传记资料的取舍方面，只字未提屈原的《九歌》、《天问》等，可能因为这些作品里有明显的多神崇拜和巫术信仰的内容。对于“龙舟节”的一些奇特习俗，她也试图给予理性化的解释。

费理雅的《屈原传》在西方汉学界产生影响。在她之后，有更多的西方学者对屈原及其作品进行了介绍和翻译，扩大了中国及其诗歌在世界上的影响。

（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“楚辞在欧美的传播与影响”（11YJC751009）阶段性成果）